

[俄罗斯] 安德烈·戈尔内赫 著
李冬梅 朱涛 译

形式论： 从结构到文本 及其界外

ФОРМАЛИЗМ:
ОТ СТРУКТУРЫ К ТЕКСТУ И
ЗА ЕГО ПРЕДЕЛЫ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丛书

XINGSHILUN: CONGJIEGOU DAO WENBEN JIQIJIEWAI

形式论：从结构到文本及其界外

[俄罗斯]安德烈·戈尔内赫 著

李冬梅 朱 涛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式论:从结构到文本及其界外/(俄罗斯)安德烈·戈尔内赫著;
李冬梅,朱涛译.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2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丛书)

ISBN 978-7-5649-3239-8

I. ①形… II. ①安… ②李… ③朱… III. ①文艺学—理论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4511 号

责任编辑 张 珊 靳开川

责任校对 靳开川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制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94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审稿人：
哲学博士，教授
卡冈·莫伊谢伊·萨莫伊洛维奇

哲学副博士，副教授
切尔托夫·列昂尼德·法伊贝舍维奇

安德烈·戈尔内赫

形式论：从结构到文本及其界外/安德烈·戈尔内赫。

——明斯克：洛格维诺夫出版社，2003 年。——312 页

ISBN 985-6701-08-2

在这部著作中尝试重建 20 世纪文艺学中形式传统(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英—美新批评和法国新批评)的一般逻辑，它们是当代阐释理论和非古典哲学的流派。本书既是专题研究，也是大学生们(哲学的、文化学的、语文的、艺术学的)和人文随笔的参考书。

前 言

想象的内容仅仅是形式分解中的方式。

安德烈·别雷

关于题词的一些想法

本书的题词之所以恰当，是因为本书是几种科学创作体裁交叉的结果。本书出发思想的最初表述出现在 1995 年的论文研究中，然后这些思想得到发展并在给学生授课时得到了阐明（首先对于作者而言），这些课是在不同时期给未来的哲学家、文化学家和艺术学家讲授的；最后，过了一段时间，作者又对论文材料和授课教程进行了加工，添加了新的章节，这些章节都是以一个作者的口吻书写，并摆脱了任何纯理论的或说教的论述。题词是一种从表面赋予该书概念上统一的一种方式，它是作品的“主要思想”和“宗旨”的表述。这种提前泄露的“宗旨”被视为将形式传统问题和各种历史人物吸引并留在周围的中心——如此一来，在阅读过程中本书就不会因为体裁多样化而招致“散乱”。然而，在这一混合体裁中也有自己的缺陷，又可以被视为优点。在掌握一定信息的同时，学生能够了解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思维方法和当代人文理论的“语言”；对于语文学专家或艺术理论家来说，学科范围可能扩大了，在这一范围中，文学形式论与传统浑然一体；除了“形式论者”对一般人文问题（“什么是作品？”“文本与生活的关系如何？”等等）的具有独到见解的答复之外，广大读者还可以得到有关思想史事实的和 20 世

纪人文科学中的理论问题研究方向的认识。

除了“宗旨”的向心功能，题词在这种情况下还作为普遍的意义情态符号而存在，是一种附属于每一个相对独立的作品片断的不可读的象形符号。安德烈·别雷的这句话，作为尚不为人知的具有完整意义的神秘符号而进入作者视线。整部书似乎是对这句话的详细注解，与其有着成千上万的联想。在这一题词的“神秘”诞生中隐含着—一个事实，即作者在题词中找到了将散在的假设和想法进行系统化的依据因素。题词仿佛成了理解风格大相径庭的理论家论点的通用钥匙，成了他们思想的独特雏形；成了建材要素而后又成为题词的这一事物，随着书的“建构”而渐渐被抛弃，但在作品完成之后，作者又颇怀谢意地想起了它。就如同孩子的小饰品，之前非常珍贵，但渐渐变成了小玩意儿，题词也被小心地从上下文去除，并作为智力顿悟的纪念性标志而被置于特殊地位。

这就是对题词的一些思考。但这些思考本身也仅仅是进行题词思考的理由。作为结构因素，题词的选择最终完全是随意的。作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而随意对其进行选择，写在序言前或者干脆放弃。但在对待题词的方式中——写在序言前——已经流露出不由作者所决定的反常的出发点、不可能的开端的特别意义。这是某种预设的“空文字”——在最初阅读题词时，我们理解不了它的语法（选择原则），也理解不了其意义（上下文）。这是一种纯粹的符号，是饱含作者意愿的亲笔题词。但正是因为它，发出的消息—文本才充满了意义。只有借助画框，我们才能在画布上清晰勾勒出轮廓本身。要想理解题词的前言意义，首先应当使题词一直处于未阅读状态，在完成文本之后再对其进行阅读。题词与作品的结尾并不呼应。它总是处于有别于作品的平面：居于特别的地位，处于较为突出的结构位置——在作品“之上”。题词——这是简短词句。同时这也是文字的开端，是来自“另一维度”（蒂尼亚诺夫）的那种开端，它的建构不仅立于文本之上，而且立于可见世界之上，并将自己的笔迹遗留其中，且浸润了其优美。在每一篇文本中都会或清晰或模糊地存在承载了意愿的“题词”。在这种背景中的题词标示了现象学轮廓，它将事物和字母联系起来，不属于语言，而属于文本中（首先是文本性的，但也有电影学的、仪式的、传记的）口头的和视觉的关系本身。重复的作用、意义产生过程中口头的和视觉的相互关

系是本书的内容丰富的主题。以题词形式出现的这一主题的二元存在——作为开场白性质的“意义文字”和作为构成题词的句子本身的意义——就同作品内容具有直接关系。在这种二元性中破译了隐含于许多变体中的核心“形式论”思想——内容存在于文本形式本身中的和其“部分”秩序之中的思想。可以说，如果写入题词中的这些句子，在阅读该书之后，仍被视为独特的概述，并被理解为演示性的开场白，那么该书就达到了目的。最终，文本只是赋予了“题词”意义，它贯穿于对其的第一阅读和第二阅读，并以此来区分这种可视笔记和自身。

导 言

文本问题与人文科学

在当代世界中,社会—历史现实及其理论反思在不同的知识领域暴露了错综复杂的相似。新时代哲学中存在的去本体论在伊·康德的先验论体系中获得更为完美的形式;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的去实体化倾向给20世纪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留下了深深的印迹;索绪尔在有关语言的科学领域中进行的革命对人文科学系统的形成产生了原则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与以下因素明显相关:中世纪那种稳定的、社会现实所固有的、微观世界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瓦解和社会发展中应变能力 and 实用主义的提升。新时代这些主要进展的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下半期的“文本革命”,承认实证性,甚至还承认意义产生过程中的“混沌”至上、“去中心化”“无主体性”“语义双关”和“游戏”(某种与“文本革命”类似的并具有超越性的情形也在自然科学中发生了,该领域引入了一些概念,如“分叉点”“可能的状况”“潜在的部分”和“不稳定性”)——显然与社会—政治的和经济的趋势、跨国资本的不可知、拒绝意识形态思维的二元论、集体与个人标志的混合等相关。我们社会中所发生的进程,可能都是这些倾向的戏剧性表现。我们认为,如果这些相似不具备特别的外部特征,那么仿佛具备了更为形式化的、游戏特征的异质的研究方法总体,即被表示为“后结构主义”的,可能在激发理解所发生现象资源时会相当有效。当标准逻辑样式正在丧失自己的阐释功能,而现实的做法是吸收那些以前尚处于边缘的要素进入阐释领域、揭示不解的事实依据、产生描述文化现象的新语言,这或许能开创基础,以便在已改变的世界中能提出更为具体的目标体系。

研究对象的极不稳定是当代人文知识的特征。围绕古典哲学已经集中了人文系列课程，它常把自然科学认识论主体的人的模型视为万能。这种模型的特征是极为抽象的，而且，实际上是构思了一个独立的欧洲人——没有身体、性别和年龄——作为自己的范例。在接触了新现实——梦境、童年、激情、创作等不同于新欧洲气质类型的现象——它们作为生产充分意义的领域，被吸收进反思有关自 19 世纪下半期起人类的科学范畴，实际上，不彻底改变自己的基础，古典哲学是不能够吸收它们的。古典文化模式本身发生了改变，这其中，相较于宗教和数学自然科学，哲学执行着综合的功能，并将二者联合入“统一科学”或能向真理提供必然的、宗教的保障思想体系（路易·阿尔都塞）的总计划范围之内。新欧洲文化已解体的符号——科学/艺术/宗教/哲学——引起了那些不具有共同的可证实性根据、不具有共同的客体（因为人的本质不是由通过专门研究而修复的片断形成，但更不是在人类学、语言学、语文学、心理学等的间隙、差异中确定的）的学科的“分散的统一”，而这种作为“人文科学”的“分散的统一”则是“哲学终结”^①的丰富注解。毫无疑问，语言本身的问题化是这次进展的中心。笛卡尔哲学的主体位于带有工具特征的万能计算的逻辑语言与自我意识的直觉之间的坐标点。将研究注意力转向自然语言就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多维的带有反从属语言—主体的和“主体性”本身的变形概念的出发点系统。语言不再被论述为抽象的规则语言体系（归根结底会被合理导出）和根据这些规则组织起来的某些语义要素的堆砌。一方面，它进入了更为普遍的符号体系；另一方面，它被分解为独立的“语言”：诗歌的和散文的，艺术的类语言（绘画、舞蹈、电影艺术等等）和体语言（“圣像语言”“古典芭蕾语言”等等）——直至艺术作品与个别文化现象的“语言体系”。

确立艺术作品和语言的等势关系直接导致提出文本问题，而且这实际上是后结构主义式的提出。结构主义在描述通用语法的合理模式和人类学、文学及其他领域的“结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们强调文艺作品“语言”（罗兰·巴尔特）、主体（雅克·拉康）、历史时代（米·福柯）的独一无二性，对普遍的语言观念产生了彻

^① 参见《人文科学概论》，纽约，1982，第 7～18 页。

底的怀疑,并将结构变形为文本。在结构中能发现“物质结构”的未弱化因素,这种结构对抗着个人意愿和意义动态的任意普遍化,消除着逻辑对立和作为抽象体系的语言的自我超越。结构“遭遇冲击”,这里谈的更多的是文本的结构效果,而非结构本身。鉴于分析调整,可以以文本身份来分析过去曾享有特权的人文知识客体——“人”“主体”(雅克·拉康的“无意识主体”)、独立艺术作品(文学、绘画、建筑等等)、艺术的类型与范围(现代主义诗歌、文学本身)——直至由逻辑推理实践和各种不同符号(“社会文本”)编织而成的社会关系的所有体系。相对文本问题,语文学、文学研究、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的传统学科界限发生了转移并变得清晰,在不少研究者看来,这足以引起整个人文研究视域的原则上的重新排列。文本概念正在成为人文学科客体不稳定性的体现。

同时,今天的“文本”概念已经不同于20世纪60~80年代“文本革命”处于高潮时那样,亦不再是人文科学中的“最新成就”。很明显,不管是“后现代文本性”理论话语,还是那些不限于任何“所指”、自由的“这样那样”的阅读实践的作为合法来源的“文本”概念本身,如今在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压力之下都丧失了自己的地位。所指、现实、历史又重新作为起源而回归,并且规定了任何意义产生的范围和明确含义。从具有实证论特征的狭隘形式论研究开始,经由作为严肃科学的文化理论的结构主义乌托邦,再到激进的非方法论和读者随意诠释等极端,形式论并没有成为僵化的教条,仍保留有与所有新的概念性的时代“挑战”打交道的能力,形式论展示的不仅是传统的明确稳定性,而且还有令其不断超越“自身界限”的内部资源。由于这种内部逻辑,穿越(或已越过)“文本”的障碍,形式论仍具有现实意义,并且对于当代人文学科来说仍是卓有成效的,正因此,研究形式论的这种内部逻辑成了本书的总目标。

这样一来,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对于20世纪形式论的命运,而且对于整个人文科学来说,文本问题都是关键的。“文本”观就是诸多失去学说完整性的流派总和,它是当代人文探索的理论主导思想之一。对它自身的考证评价不一,通常都归于后现代派。但是作为核心概念之一,文本概念还是在符号学,后来的诠释学,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结构主

义等学派之中突显出来。这种学科内部观点的多样性与跨学科性^①一起赋予了文本问题的分量,并且,由于如今所观察到的当代三大主要哲学流派的趋同——盎格鲁—撒克逊的实证主义路线、德国现象学—诠释学传统和法国结构主义——而渐渐汇入总的形式。因此,不管是从局部任务观和内部结构来看,还是从有关人在世界中及其与世界的对应关系这一基本问题来看,“文本”都已成为当代人文学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文本”与研究的“语境”

“形式论”是一个比“文本”还要复杂的概念。比如,可以谈论伦理学或逻辑学中的“形式论”传统(相应地起源于康德和莱布尼茨)。本研究的对象是文艺学的和美学的形式论。但它的基本主题——文本问题,换句话说,即本质的、结构的和句子之上连贯性及符号群的完整性的效果等问题——被列入更为广泛的语境。而为了在更为普遍的当代人文学的坐标体系中对所研究的形式传统做一定位,必须先确定语境。

当代类型的文本问题形成的概念基础是弗·尼采、弗·德·索绪尔和西·弗洛伊德的著作。^②而关于文本现象的林林总总、变化多端的研究立场却体现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之中。普遍形式的文本概念自身包含了对所有具备外部连贯性和内部意义完整性这些特点的符号单位的认识。P. 博格兰特更明确地阐述了文本性的标准及对这些标准的阐释和描述,并且构建了文本符号学的问题范畴:连贯性(coherence)、完整性(cohesion)、意向性、情境性、互文性、信息量。^③文本概念的规模随以下几种比率而发生变动:(a) 客体,尤其是由口头符号组成的——由被视为符号的较为随意的要素(物体,形象,手势);(b) 凭经验感知的客体(书面的文本,记录的声音)——理论构想;(c) 符号的线条式连续性——具有非线性组织的客体;(d) 超出一定规模的

① 甚至还有“反学科性”。参见J. 莫威特:《文本:一个反学科客体的谱系》,杜伦,伦敦,1992。

② 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对文本问题进行的研究规模请参见作者的文章《文本问题:精神分析观点》(白俄国立大学学报,1995,第3辑第3期,第47~51页)。

③ P. 博格兰特:《文本,话语和过程》,诺伍德,1980,第199页。

客体(如句子)——被视为不受规模^①限制的功能单位的客体。在所提及的方法中还有一种倾向,即将文本与话语^②这些概念等同,这种倾向的目的是去除与强调文本的口头的及书面记录的特征相关的可能出现的限制(Θ. 邦佛尼斯特,Z. 哈里斯)。

文艺学中的结构主义流派(从艾·苏里奥、弗·普罗普、A. 若勒的前结构主义体系到 A. 格雷马斯、克·布雷蒙、茨·托多罗夫的观点),依据弗·德·索绪尔有关语言与言语的区别的方法论公设,树立了自己的目标,即从文学的个性表达中分离出一般性的“语言”一体系、“叙述逻辑”“叙述体语法”等等。对这种不变性结构和转换规则的描述(与此相应,具体作品可能会被作为变体而引出),根据该流派代表的看法,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批评阐释任务并构建文学理论的科研基础。如此一来,确定问题范围的与其说是单个作品的结构,不如说是一般性的模式(参与性的、叙述性的)、文学的“最文本”(热·热奈特)。在克·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观点中,作为文本来研究的不仅仅是以书面形式记录的概念结构,还有人们感知现实现象的方式本身,包括接受的感知水平。在否定任意的哲学二元论的同时,克·列维-施特劳斯在论证中赞成最“直接的”体验、被思维加工过的信息^③等的二元对立形式的隐晦性(文本性)。

在诠释学传统(弗·施莱尔马赫、威廉·狄尔泰、马丁·海德格尔、鲁·布尔特曼、汉-格·伽达默尔、埃·贝提、保罗·利科、卡尔·阿佩尔等等)中文本概念发生了明显的演变。在弗·施莱尔马赫和威廉·狄尔泰的早期看法中,文本被视为书面记录、作者个性或需要得到改造的个体与文化的共同生命精神的再现,要克服历史距离,并透过文本本身“融入”它们。埃·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将对象、内容和意识行为植根于我思的反思之前的普遍无前提认知层,在此基础上,稍晚的诠释学在理解结构时进行了去心理分析并将其作为人类存在的本体真实性进

① 参见《符号学百科词典》,柏林,纽约,阿姆斯特丹,1986,第2卷,第1080页。

② T. 杰克把话语定义为“语言形式、意义和行为的复杂统一体”(T. A. 王杰克:《语言·认知·交际》,莫斯科,1989,第121页)。

③ 参见克·列维-施特劳斯:《原始思维》,莫斯科,1994。

行了分析(马丁·海德格尔)。书面文本成了诠释客体本身。而主观性,不论是个性中的还是先天本质中的,都被排除在分析之外。遭到驳斥的是有关唯一的、真正文本意义的论点,相应地,还有再现导向的阐释方法。文本被视为无限多义的生成物,是面向全新意义并能生产之的有效阅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文本被极为泛泛地确定为完整存在于具体作品意义深处的文字、文学、“语言的抽象理想”(汉-格·伽达默尔)。^①由此得出文本阐释时的“诠释学系列”的普遍方法论问题。威廉·狄尔泰以下列方式强调了系列循环:(1)文本是循序渐进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得到理解,但单个部分的完整意义则是在理解了作为整体的文本之后才能得到把握;(2)具体的文本源自作者的一般生活场景,但后者自身则经过文本才有可能被理解;(3)体裁规范是由文学作品的总体性所得——文学系统和传统本身也决定着任何一部作品的意义。在晚期诠释学观点中一系列概念“文本部分/整个文本”“文本/语境”“文本/文本总体”被概括为来自整体的部分前理解结构,反之亦然。^②

在后结构主义对待文本现象的种种方法中,“互文性”概念往往被视为关键术语。这一概念是由朱·克里斯特瓦在受到米·米·巴赫金著作影响之后提出的,并在罗兰·巴尔特的著作^③中被奉为经典。其实,作为稳定的、在当代人文科学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文本”术语的推行则正是与后结构主义相关。“文本”与“互文”在某种意义上是等效概念。互文可以理解为无尽的佚名文化符号的、引文的、互相参见和不同文本交叉的领域。和它相一致的是在该领域中未确定界限的任意局部文本的现实存在方式(阅读)——文本令分布为无限无形态的意义产生之网的联想之链更具有现实意义。为了强调文本的特殊地位,罗兰·巴尔特引入“文本”的对分来作为高效进程,引入“作品”的对分来作为产生自我相似的幻觉的外部固定形式,而朱·克里斯特瓦区别了“表现文本”和“基因文本”。前者是稳定的文本结构,由不同层次(从音位到语义)的严格对立构成,而后者——本身就是意指的过程,是各种结构化的移动基质。一系列确定的文本分类显得很突出,它们有:(1)开放

① 汉-格·伽达默尔:《真理和方法》,莫斯科,1988,第456页。

② 参见汉-格·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莫斯科,1991,第72~73页。

③ 参见罗兰·巴尔特:《作品选集:符号学·诗学》,莫斯科,1989。

性、无限性(与封闭性和具体性相反);(2)意义的多样性;(3)文本作者和读者的去个人化;(4)文本之中书写与阅读的对称性,意义的消费与生产过程的对称;(5)与语法概念、规则、方法的原则上不相容性;(6)作为基本原则和目标的愉悦一享受(jouissance)。从这些立场出发,文本基本上不再问题化:不必去寻找它——它比比皆是,我们所有的经历都受益于不同的文化符号和主题;对它进行分析也是毫无意义可言——意义相当不确定,并且自身就充满了差异,能做的只是服从意义游戏,而这首先要求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不可缺少的专注。有关后结构主义批判态度的认识就是如此夸张,其论敌责咎之,而追随者发扬之。

与此同时,在后结构主义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在我们看来,更为实证的论述,主要针对雅克·德里达的“一切都是文本”的表述,还包括雅克·拉康的最新心理分析观点,吉尔·德勒兹、菲·瓜塔里、弗·詹姆逊的社会一批评观。与对待文本的纯粹语言学的、语文学的方法或工具主义式的阐释不同的是,这些作家在处理中发展了一种复杂的文本问题解析,由此广泛的文化—人类学前景才得以渐渐清晰。而对这些观念的分析,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将会成为所做研究的必然后续。本书正是以此方向为定位,旨在揭示并发展“文本”这一关键概念中的“形式方法”的启发性潜能,而“形式方法”则被视为我们这个世纪最普遍最具影响力的人文战略之一。

* * *

《形式论:从结构到文本及其界外》这本书是对形式论进行的批评性构建。形式论是文艺学中的理论和方法论,对20世纪人文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显示出相当可观的启发性潜能,不仅表现在文学作品的阐释,还反映在可视的和社会文本的阐释中。基于此性质的构建以完成两项普通任务为导向。最低任务——展示具体阐释作品的例子,这些阐释动用了能够扩充理解的新资源,展示对待文本的精心、“接近的”、非简化态度的例子。最高任务——揭示对待主要阐释理论问题的形式立场的特点:文本中象征性的(口头的)成分和形象的(可视的)成分的相互关系;将口头单位象征性地联结为句子之上的群的本质、方式和功能。借助于此,扩大了看待形式论的视角,将其视为对关

于“形式与内容”对立的一贯偏见进行系统问题化的尝试，揭示了新论述的非典型哲学化前景，乃至消除这种对立等的大致轮廓。

在扩大这种视角的情形下，我们渐渐从诗学文本的连贯性和完整性的局部问题转向了对文本在形式传统中的极为宽泛的理解，即将其视为：(1)符号系统，在这里每个要素的意义取决于与其他要素的相关性，且非线性的、非叙述的结构逻辑在起着作用；(2)个性化机制(实体)，它在生产命题的个性化模式和艺术中运行^①；(3)诗歌、电影、梦境中守旧礼仪技巧的表示方式，这些技巧决定了联想形象和直接交际；(4)一个人接受世界的通用方式。在我们看来，在这种转向中正蕴含着一个被视为越出文本“之界”的问题，它是通过“内在性的悖论”和文本中存在着异于它的个性化要素和社会体验要素的悖论而揭示出来的。在这种已确定的视域中，文本本质与“创伤”现象相关，而这种“创伤”在广阔的范围中被视为：混乱不堪的外部体验的影响(海·韦尔夫林，安·别雷)、遭遇创伤的儿童经历(谢·爱森斯坦，让·皮·理查尔，夏尔·莫隆)、基本的人类学经验(弗·尼采，K. 贝尔克)。作为产生文本机制的“创伤”这一概念成了后结构主义反思的核心对象之一，在“缺陷”(雅克·拉康)、创伤性的“古老图形”“身体上的文字”(吉尔·德勒兹，菲·瓜塔里)、“危险的修补”(雅克·德里达)这些术语中得到了发展，并替代了各种不同的结构主义话语语法的变体^②。在形式战略前景中文本问题获得了人类学的补充：从尼采式的身体—舞蹈—文本

① “每一个文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独特的模式”——在罗兰·巴爾特的表述中，这就是法国新批评的真理之一(与罗兰·巴尔特的一次交谈// 时代的标志，剑桥，1977，第44页)。可是，[俄罗斯形式论和英—美新批评]是以何种“奇怪的、间接的方式预示法国新批评”(S. 多布罗夫斯基：《法国的新批评》，芝加哥，伦敦，1973，第12页)，有关这一问题仍然是开放性的并需要独立的研究。

② 参见雅·拉康：《文选》，巴黎，1966；吉·德勒兹、菲·瓜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第1卷，巴黎，1972；《反俄狄浦斯》；雅·德里达：《论文字学》，巴黎，1967。

的直觉经由形式论对作品的意义和所有要素相互依赖性、诗语重复现象^①的结构的发现——在致力于克服文本中的如音响/意义、形式/内容、可视的/想象的等典型二分现象中发展了形式方法，这是探索处于社会分配的、现实的象征主义领域中完整物质形象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文本不再是根据已有的语言系统中提出的^②规则联合在一起的词语—符号的总和，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身兼完整的形象大符号与独立的语言微系统于一体，在现实实践中位于符号及语言的抽象之前^③。

文本不具有部分本身，它是由自我参照效应组成，这些被阿·希尔德布兰德描述为“造型表象”，弗·尼采和安·别雷——“象征”，俄罗斯形式论者——动态形象，谢·爱森斯坦——图形单位，英—美“新批评”——“好感”，让·皮·理查尔——“景观”“物质行为倾向”。“舞蹈”“音响手势”“象征行为”“身体模仿”——文本的自我参照“工作”的纲要，其作为无意识的基本“逻辑”曾得到吉·德勒兹和菲·瓜塔里在非常广阔的人类学前景中的研究，而这种无意识“什么也不表示，但却在发生……不意味着什么，却在工作”^④。文本的自我参照使机制遭遇了特殊的直接交际和被联络者的“展示”，而这种“展示”^⑤的特征是缺少

① 吉尔·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一书中对“重复”现象在其数量和程度上展开了有力的解析；艺术、仪式被视为“一切重复共存的地方”、病态的宇宙论（参见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巴黎，1985，第371页）。

② 这里也蕴含有拉康的“回归弗洛伊德”的基本原则之一，规定拒绝任何固定的象征符号和梦境文本的普遍语言体系。

③ 这一思想后来在尤·洛特曼那里得到发展，他认为，“文本比语言更早由集体获得，语言自文本而计算出”（尤·米·洛特曼：《文集》3卷本，塔林，1992，第1卷，第150页）。

④ 吉尔·德勒兹、菲·瓜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反俄狄浦斯》，巴黎，1972，第109页。

⑤ 意义直观化倾向是所有非古典哲学研究的特征。我们较早地援引了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有关这些的论述。下面是维特根斯坦对此的描述：“句子能展示自己的意义。……要理解句子的内涵，我们会回忆起象形文字，它通过形象来讲述事实……我理解句子时，不需要别人向我解释它的意义。”（路·维特根斯坦：《哲学著作》第1部，莫斯科，1994，第20页）

中立的符号媒介^①。在这种机制中个体传达着、表露着自己的意愿，而集体向个体传递着意愿主体从属群体的“知识”。在此基础上“个体与社会在漫长的相互交流中以象征性的表示建构着被称之为文明的金字塔结构”（爱德华·萨丕尔）^②。直接交际可以转换为采用工具符号并要求外部符号和解释程序的间接交际，对这一转换的本质研究始于形式传统，它使人们勾勒出了致力于描述这种转换条件和形式的批评阐释（或反阐释）的大致轮廓，这令人们能够从新的角度接近文艺作品的意义问题和社会交际的普遍看法^③。

类似结论驳斥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俄罗斯形式论的观点曾被视为文学理论发展的前结构主义阶段。由这种立场出发，必然产生两种忽视了被考察流派特点的极端：（1）错误等同了形式的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该论点认为，前者的优先任务是描述属于凌驾于句子之上的统一体的诗学组织语音的不变结构；（2）将弗·普罗普的叙事分析作为形式方法范例，他后来的批评立场则是基于论证更为广泛的文化符号、文本阐释所需的阅读协定及走向文本之外的现实等的必要性^④。

文本分析的特殊性不仅限于引入特别的描写程序来说明本质上的不确定性、作品的多义性，这与旨在确定准确意义的语言学的或语文学的分析恰恰相反。文本分析是一种总结，也是一种创造行为（自乔·斯宾加恩到罗兰·巴爾特的整个新批评的基调也在于此，其范围内的差异与对该行为是如何实现的这一具体解释相关），并从自身分出那种从

① 谢·爱森斯坦还研究了自己的“杂耍蒙太奇”，即一种直接借助造型来影响观众的观点。

② 爱·萨丕尔：《文化学与语言学选集》，莫斯科，1993，第209页。

③ “元解释”或“否定的阐释”，当代美国文化学家弗·詹姆斯如此称呼这门学科。元解释的使命是要去发现将作品的原初意义（在詹姆斯看来，它是个人与集体的象征标志，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中分离和疏远过程的加深而变得艰难）排挤到“第二”位的原因和形式，并据此复原回到意义本身，因为“内容不需要得到分析和阐释，是因为它本身在本质上已经直接被赋予了意义，就像手势一样被赋予了意义”（弗·詹姆斯：《元评论//理论的意识形态：1971～1986年随笔》，明尼阿波利斯，1988，卷1《理论形势》，第14页）。

④ 参见克·列维-施特劳斯：《结构和形式//民间创作符号学的国外研究》，莫斯科，1985；乔·卡勒：《结构主义诗学》，伦敦，1975，等等。